

农民行为主体视角下中国革命特殊性的理论解读

刘文沛

(西北政法大学 陕西 西安 710122)

【内容摘要】农民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最具有革命性的行为主体,是决定中国革命和现代化道路的决定性力量。近代中国革命有其自身特殊性,从革命的力量来说,中国革命是一场依靠农民的革命;从革命的组织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革命型政党的领导;从革命的方式来说,中国革命具有强大的动员型特征;从革命的历史逻辑来说,中国革命本身蕴含了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农民在革命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了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这是新时期国家解决农民问题的政治前提。

【关键词】农民 革命 行为主体 特殊性

中图分类号:D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1)11-0007-03

中国革命最明显地表现出是以农民为基础的社会革命,农民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最具有革命性的行为主体,是决定中国革命和现代化道路的决定性力量。关于中国革命发生学与农民这一革命行为主体的政治关系,学界基本存在两种观点,笔者将之概括为“农民革命潜能说”和“政党组织动员说”。

第一种观点强调革命发生的根源在于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结构中固有的冲突。如摩尔的研究认为,农民起义“是中国社会中特有的标志,其原因与传统中国社会的构架有关”^[1](P173)]。农民阶级长期遭受传统官僚体制的压迫和剥削,中国共产党借助种种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发动农民,促使其阶级意识觉醒,进而成为传统政治秩序的反抗者。这种解释模式认为中国农村社会拥有强大的革命潜力,中共通过群众路线来唤醒农民,释放这种潜力。

另一种观点虽然同意农村社会中蕴藏着革命潜能的说法,但更加强调革命政党在动员和组织农民方面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这种观点认为,正是中共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组织效率使传统中国社会中分散的、远离政治的、由一个个家庭细胞组成的单位被纳入规范的、等级制的严密结构中,从而使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得以形成。如林尚立教授指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成功,而中国共产党成功的领导,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为对中国传统乡村的开发、动员和组织,在广袤的乡村社会建立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革命根据地,将如马铃薯般分散存在的农民动员和凝聚成为有组织、有纪律、能战斗的革命中坚力量。”^[2]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事实上并不矛盾,各自强调了中国革命特殊性的不同方面。中国革命具有历史连续性和继承性,传统社会阶级冲突的高度激化与中国共产党成功的领导是一种时代的契合,把二者结合起来更利于全面深刻地理解中国革命。

对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西方现有的诸多革命理论也进行过不同的解释。如亨廷顿通过比较研究,认为造成东西方革命差异的主要因素是革命前政权的性质不同,中国革命是从狭隘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权中产生的^[3](P227)]。斯考切波从旧制度的结构和社会危机冲突中指出,中国革命的模式是从外围走向中心,农民不仅充当了革命反叛的主要力量,而且成为巩固国家权力的有组织群众基础^[4](P289)]。很显然,诸多的理论分析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革命的理解。然而,邹说先生却认为已有的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大多数研究成果,在理论分析和历史叙述之间,缺乏一种有机的统一。尤其是所参照的框架、概念体系以及理论陈述,往往和常规的历史叙述完全不相干。因此,诸如结构性的因素并不能解释中国革命的结果。对中国革命的阐释,需要从某个特定的角度分析入手,即应对中国革命中行为主体^①的关注,从而分析在结构约束下的人的选择。笔者认为从革命行为主体的角度来分析,近代中国革命具有以下特殊性。

一、从革命的力量来说,中国革命是依靠农民的革命

首先,农民与革命的天然联系,作为潜在革命群体的农民蕴含着巨大的变革力量。马克思强调经济因素是社会阶级的决定因素。任何一个群体的基本态度,都主要取决于这个群体的构成和结构性地位,取决于其在官僚政权和统治者政策的框架之中所能获得的潜在或实际利益。中国农民在官僚政治体制之下的经济社会生活决定了他们在政治结构中的阶级地位,即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极具忍耐性的群体。亨廷顿以政治学家的眼光观察到,一个社会是否会走上具有革命性质的发展道路,与农民有直接关系,只有当中等阶级和农民一致反对现存政治体系,才易于发生革命^[5](P76)]。因此,中国革命的爆发与农村集团潜存的变革性和参与性密不可分。

* 作者简介:刘文沛(1979-),女,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其次,依靠农民是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的战略选择。中国革命早期重视的是城市而不是农村。北伐之前,农民作为革命的潜在力量几乎没有受到注意。在城市革命屡屡受挫的情况下,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进行了科学分析,明确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以农民为主体的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真正朋友。其中,农民是最关键的革命力量,“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绝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必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5](P17)}农民阶级是中国社会中的革命阶级,中国革命的成功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并依据中国社会革命的性质以及革命的任务,合理、有效地将有关阶级动员起来,成为团结在中国共产党人周围的革命力量,形成强大的革命统一战线。

再次,中国革命军队的最初创建离不开农民的积极参与。事实上,作为中国革命支柱的人民军队主要是由穿上军装的农民组成的。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探索如何在以农民为主体的条件下建立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新型军队的问题。1928年5月25日中国共产党制订了《中共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规定“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6](P233)}同时,还规定了红军的成分主要是工农分子。尽管红军刚创立时成分复杂,一部分是旧军人,一部分是农民^②,但农民对中国军队的创立有着重要的贡献,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7](P979)}。

二、从革命的组织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革命型政党的领导

组织是权力的来源之一,组织通过体现一套特殊的价值观而获得了一种“独特身份”。^{[8](P28)}无产阶级政党组织正是通过其特殊的革命价值观而获得了领导革命的独特权威。20世纪以来的中国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要组成阶级并团结广大劳动群众进行革命行动,就需要有自己的政党和革命理论。组织政党对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具有四方面的意义:第一,使无产阶级能作为一个阶级采取行动;第二,能最大限度地团结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第三,能根据形势的特点,提出革命的策略和任务;第四,能使革命成为有组织的政治行动。^{[9](P435-436)}因此,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的创立是使革命形势形成成为强大的群众革命力量的关键。

近代中国漫长的革命历程从一开始就是由一组革命者所领导的。帝国体系解体后,中国政治舞台上先后出现了三种政治势力: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军阀反革命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温和派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激进派。各派政治力量相互竞争、对抗、合作、妥协,共同演绎了中国近代纷繁复杂的革命时代。

帝国解体后,军阀政治作为一种特殊的过渡政治形态,维持了短暂的权力虽微弱却集中的政治秩序。但军队力量

与地方主义的结合,无法承担对社会的整合和领导作用,带来的必然是分散态势的军阀割据和强权政治,^[10]直到北伐之后中国才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此后,中国革命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政党的博弈过程中展开。

国共两党的性质不同,一个是资产阶级政党,一个是无产阶级政党,两者分别代表不同的阶级势力,具有不同的历史使命,因此,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和态度截然不同。国民党在革命期间的首要战略是完成国家的统一,由此而展开的种种斗争策略加剧了中国的分裂,并降低了其革命领导权的正当性。从“党力”来说,国民党从来不是一个具有严密组织和高度内聚力的政党,党组织长期处于派系纷争和软弱涣散的状态中,缺乏真正的社会阶级基础,甚至将自身的基础建立在彼此利益相互冲突的各阶级联盟之上,在革命进程中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弱势独裁政党”的特征。^{[11](P361)}尤其在处理农民问题时,国民党选择了一条极权主义的路径,利用军队这一暴力工具推动农村土地政策,企图通过反革命道路的方式使中国走向现代国家,其结果遏制了民众运动,在意识形态层面完全排斥了民众的政治参与,政党的革命性色彩荡然无存。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由于在意识形态和策略上的原因,目标是扩大政治参与,促使更多的群众投入政治,从而增强自身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作为列宁式的革命性政党,深刻地认识到建立严密组织体系对于增强政党凝聚力的重要性,在革命的基层地区普遍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组织。在土地问题上,共产党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分配方式,“不是以整个家庭为单位,而是按人口来进行”,因此共产党从基础上把农村体制打破了,使得地产与亲属关系之间的联系荡然无存,有力地释放了阶级之间的对抗情绪。^{[12](P180)}从组织的角度来讲,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高度革命意识的政党,能够将中国最庞大的社会力量有效地组织和动员起来,充当了革命的领导,使得革命越演越烈。中共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建立了革命阶级的联盟,将千千万万不知政治为何物的下层民众组织起来参与政治,使民众运动有了内聚力、方向和领导。

由此可见,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国政党政治成长的历史。中国政党的产生模式属“次生型模式”,由政党来领导革命有其必然性。政党的性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革命道路的走向。

三、从革命的方式来说,中国革命具强大的动员型特征

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的真正展开,需要有强大的群众革命行动。这种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取决于群众自身的觉悟,另一方面取决于革命者即革命的先进分子或领导者为争取和团结所有革命力量所作的主观努力。“工人阶级所承担的伟大任务是启发一切民主群众的革命意识,在斗争中教育他们,领导他们进行猛烈的冲击。”^{[12](P442)}群众的觉悟和革命意识是革命能否进行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因素。

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已经认识到中国革命本身的内在逻辑:广大农民群众是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在具体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大规模群众动员的方式来调动各革命阶级进行广泛的政治参与,使之积极投身于革命运动,形成党的“群众路线”。因此,中国革命呈现出特

有的政治动员型特点,并直接影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建设战略。

“群众运动”指的是单独一个阶级或若干阶级或阶层参与的集体社会政治行动。群众路线的提出是为了指导建立群众与领导之间的“正确”关系。群众运动用来在社会革命与阶级斗争的总背景下实现特定时期的特定目标。这些特定目标经常以保障根据一种特殊阶级结构分析方法认定的受压迫群众的社会经济权利为中心。中共的革命经历,从湖南农民运动、后来的土地革命与土地调查运动、到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清楚地展示了群众运动是保障下层群体社会经济权利的最有效的手段。在整个革命时期,群众运动也被用来摧毁上层阶级的政治权力以及在其支配下的中介社会机构。在破坏的过程中,党建立了新的群众组织,产生了新的积极分子。

“群众”在中国政治语境中具有特殊含义,既不同于“人民”,也不同于“公民”,“群众”与“阶级”之间的关系也很难确定,但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群众路线考虑农民的直接利益,通过群众路线可以了解到农民的实际利益。正是通过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政策,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期间成功地找到并维持了党的根本革命利益——这必须被置于优先地位——与农民以及其他社会团体所认定的经济利益——这是不应该(或不能)牺牲的——之间的适当平衡^{[13][P13]}。这种均衡是农民给予中国共产党政治和军事支持的必要前提,也是党具有领导农民实现最终目标之能力的必要前提。

亨廷顿指出,革命的实质是政治意识的迅速扩展和新的集团迅速被动员起来投入政治的过程。成功的革命要求把迅速的政治动员和迅速的政治制度化结合在一起。一场全面的革命意味着对现存政治制度的迅速而猛烈的摧毁,意味着动员新的集团投入政治,并意味着新的政治制度的创立。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动员群众革命的同时,成功地建立了各革命根据地组织,并使之制度化,在此基础上,逐渐建立了新的政治秩序。

四、从革命的历史逻辑来说,中国革命本身蕴含了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西方学者认为,从近代革命的历程来看,中国革命的发生先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在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政治的一支主要力量并开始规定其方向之前,革命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对当代政治的任何一种分析都必须强调这一事实,即共产主义中国是中国革命的产物^{[14][P33]}。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把握中国革命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呢?

对中国革命的把握,必须放在近代中国这一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近代中国的社会和历史决定了中国革命有其特定的历史逻辑和实现方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认为,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或者说社会性质,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依据。同样,也是中国革命历史逻辑的基本依据。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再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然而,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存在。这就意味着,中国革命的历史逻辑,既是近代中国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决定的,同时也是世界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所决定的。世界范围内的阶级

关系和革命形势的变化使得中国革命呈现出特殊性,以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为标志,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分为“旧”、“新”两个阶段。因此,中国革命呈现出自身的特性,形成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一个前后之间具有深刻逻辑联系的历史演进进程。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民主共和国是中国革命的必然走向。

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革命缔造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农民理所当然成为新社会的主人,我们毫不怀疑这一历史事实。然而,在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农民是否一直保持着其主体地位,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对广大农民来说还意味着什么?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是新时期国家解决农民问题所必须回答的。

注释:

①邹说在《中国革命再解释》中引用了 Roy Hofheinz Jr.在 The Ecology of Chinese Communist Success(1969)中的研究结论,其中提到的“行为”指的是一系列特点,例如革命运动本身的可行性和生命力、革命组织发展的内在过程、人员的素质构成以及吸收新成员的严格程度等。

②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明了当时边界红军的来源:(一)潮汕叶贺旧部;(二)前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三)平浏的农民;(四)湖南的农民和水口山的工人;(五)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吴尚、熊式辉等部的俘虏兵;(六)边界各县的农民。但是叶贺旧部、警卫团和平浏农民,经过一年多的战斗,只剩下三分之一。湖南农民,伤亡也大。因此,前四项虽然至今还是红军第四军的骨干,但已远不如后二项多。《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页。

参考文献:

- [1][美]巴林顿·摩尔、拓夫等译.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 [2]林尚立.革命与乡村:中国的逻辑——读《革命与乡村》丛书[J].中共党史研究,2008:1.
- [3][美]亨廷顿、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4][美]西达·斯考切波、何俊志等译.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
- [8][美]JW·理查德·斯科特、姚伟等译.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 [9]王沪宁.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 [10]胡玉海.近代中国军阀政治的形成及特征[J].社会科学辑刊,2003:1.
- [11]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 [12]列宁.列宁选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 [13]邹说.中国革命再解释[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
- [14][美]詹姆斯·R·汤森、顾速等译.中国政治[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